

# 清初漢文人心態的轉變及其對詩詞 風氣的影響

——以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

王力堅

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 一、引言

從歷史層面考察，清初<sup>1</sup>是一個由亂世走向盛世<sup>2</sup>的過程；從文學史層面考察，清初文學也正是一個從衰頹走向繁榮的過程。歷來學界已多從鼎革易代、隱遁逃禪、程朱理學、經世實學、文學觀念等不同角度，對這樣一個過程進行探討<sup>3</sup>。然而，當聚焦於清初文學主流——詩詞的風氣發展演變時，則可以從上述

---

本文為筆者已結案之科技部專題計畫「清初漢文人心態的轉變及其對文學的影響——以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MOST 103-2410-H-008-042-)之部分研究成果修改而成。兩位專家學者的匿名審查意見，以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編輯部的決審意見，使本文受益匪淺，特此謹致深摯謝意。

<sup>1</sup> 本文所稱「清初」，主要指順治、康熙二朝。

<sup>2</sup> 本文所稱「盛世」，主要指涉康熙朝中後期至乾隆朝的主流表現（不排除有積弊與危機），此乃學界歷來採用的相對性批判性變易史觀。參劉煥性：〈「康乾盛世」之說的由來〉，《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108-109；劉文鵬：〈在政治與學術之間——20世紀以來的「康乾盛世」研究〉，《學術界》總第146期（2010年7月），頁174-191。本文所論，則更多立足於當時朝野的自我認知。

<sup>3</sup> 參毛文芳：〈一則文化扮裝之謎：清初〈楓江漁父圖〉題詠研究〉，《清華學報》第36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465-521；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289-344；張政偉：〈以經為法：廖燕文學觀的另一個面向〉，《靜宜中文學報》第1期（2012年6月），頁121-144；李嬋娟：〈從《國朝三家文鈔》之編選看清初文風之轉變〉，《深圳大學

諸多因素交互作用之中，梳理出一個頗具邏輯性進展的現象：清初詩詞的發展演變，跟詩詞觀念的變化密切相關；詩詞觀念的變化，跟漢文人對滿清王朝的心態轉變密切相關。由此更進一步，還須注意的一個歷史現象是，漢文人心態的轉變，顯然又跟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舉辦密切相關。

雖然清聖祖 (1654-1722) 是在康熙十七年 (1678) 正月二十三日下詔徵舉博學鴻儒，但博學鴻儒科的考試時間在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故史上習稱「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滿清朝廷先後三次詔開博學鴻儒科，即康熙十八年、雍正十一年 (1733)、乾隆元年 (1736)<sup>4</sup>。此外，還有一次「流產」的博學鴻儒科：道光三十年 (1850)，候補京堂張錫庚 (?-1861) 請復開博學鴻詞科，以備人才。禮部議以非當務之急而止<sup>5</sup>。事實上，雍正十一年的博學鴻儒科也最終是無疾而終——朝野反映奇冷（僅河東督臣舉一人，直隸督臣舉二人），二年後清世宗 (1678-1735) 駕崩，便再無下文。乾隆元年的博學鴻儒科則為招攬賢才以裝點休明的常態化表現。相比之下，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科，在特殊的歷史時代背景下，顯示了別具一格的意義，對當時諸多方面尤其是詩詞風氣的影響也尤為深刻。

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所考為「璿璣玉衡賦」一篇，「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昭示了朝廷所重視者，形式為韻文學，內容為歌功頌德。所舉博學鴻儒，多為當時文壇大家，尤其是詩詞領域的領軍人物，如尤侗 (1618-1704)、施閏章 (1618-1683)、毛奇齡 (1623-1716)、汪琬 (1624-1691)、陳維崧 (1625-1682)、朱彝尊 (1629-1709)、彭孫遹 (1631-1700)、李因篤 (1632-1692)、徐鉉 (1636-1708)、潘耒 (1646-1708) 等。作為中國傳統文學主流創作，詩詞對現實時代的反映甚為直接，配合現實時代的需要亦甚為密切<sup>6</sup>。

---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3期(2006年5月),頁95-101;蔣寅:〈「神韻」與「性靈」的消長——康乾之際詩學觀念嬗變之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2年5月),頁10-26;劉敬:〈清初的逃禪風潮與文學通變——由逃禪復社士人的文學活動看復古文學思想的清初走向〉,《文學與文化》2014年第1期,頁128-133。

<sup>4</sup> 關於清代三次博學鴻儒科概況,參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年),第2冊,頁1318-1319。

<sup>5</sup> 參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1991年),第4冊,頁3194。

<sup>6</sup> 文與賦在當時的功用亦大致如此,尤其是賦,博學鴻儒科所考「璿璣玉衡賦」已見歌功頌德的訴求,康熙十八年朱彝尊隨聖祖出巡,作〈春蒐賦〉,更極盡渲染「超百王之聖域,

誠然，人類行為的因果，往往是多對多 (many to many) 的關聯——即許多不同的原因，往往會導致相同的結果。清初漢文人心態的轉變，以及詩詞的發展演變，也必然會有許多不同的原因。本文之所以將對清初漢文人心態及詩詞風氣轉折點的考察，聚焦於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是基於如此認知：無論是從歷時性 (diachronic) 的時代進程發展，還是共時性 (synchronic) 的社會環境變化來看，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都是一個極佳歷史機遇的選擇與掌握。就是說滿清王朝定鼎中國過程採用的軍事征服、政治管理、經濟復興、文化融會等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舉措，在經歷三十多年運作之後，到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舉行，其成效的發揮與交匯獲得一個極佳的機會；漢文人心態與詩詞風氣的發展演變，也都在經歷了諸多因素綜合交互作用下的漸進過程後，至康熙十八年前後有了一個頗具關鍵性的交集：大批博學鴻儒先後匯集京都，通過文集刊刻、詩詞唱和，乃至進獻應制，不僅進一步加強文人間的文學交流與發展，致使浙西詞派與神韻詩派得以成型；還進一步加強了清聖祖與漢文人的關係，使滿清統治者的文治<sup>7</sup>方略與漢文人的心態轉型，得以因勢利導的深化與水到渠成的匯通<sup>8</sup>。

概言之，清初的時代、社會、政治、文化、文學等諸多因素，在動盪、變化、交集、演進，乃至重新組合的發展過程中，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舉辦是一個十分關鍵的聚焦點——時代的紛亂至此遂可理順，歷史的進程至此呈現拐點，民族的衝突至此轉向化解，詩詞的發展亦至此漸入新境。

---

漱《六藝》之神淵；德無遠而勿屆，聲有濯而彌宣；舞兩階之干羽，靖萬里之戈鋌；雨洗炎洲之瘴，波澄閩海之煙……照華薄以春曦，泱恩膏於靈沼；爭擊壤兮康衢，永銷兵兮海表」的盛世氣象，突顯「稽春蒐之盛禮，允治世之大經」的主題，理直氣壯宣稱：「敢擬《廣成》之頌，用垂休美之聲！」（〔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44）限於篇幅，本文討論集中於詩詞領域。小說與戲劇則有大不一樣的表現及發展背景。

<sup>7</sup> 所謂「文治」，即以文教禮樂治理社會。清初朝廷實施的文治，除了開科取士，還包括尊祭孔子，宣導程朱理學，編修《明史》及其他大型文化典籍，如《古今圖書集成》、《淵鑿類函》、《全唐詩》等。如此文治，顯然是以漢文化作為新朝的主流社會價值，然而，並不意味是「漢化」，滿清統治者仍然採取種種措施，保持其民族文化特性。參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9-60；劉方玲：〈得國之正到承統之正：清史中的正統論〉，《求索》2008年第9期，頁221-223；高強：〈試論清廷封禁東北之根源〉，《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2期（2008年4月），頁44-46轉55。

<sup>8</sup> 以上一段的思考，受啟發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編輯部決審意見，謹致誠摯謝意。

## 二、由武功到文治：歷史脈絡化<sup>9</sup>的進程

民心（尤其是文人之心）的背向，是滿清政權能否定鼎中原的關鍵。對此，滿清統治者顯然有頗為清醒的認識。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甫進北京，便親諭吏部：「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sup>10</sup>清王朝開國元勳范文程（1596-1666）於順治二年（1645）的上疏更一針見血地揭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sup>11</sup>浙江總督張存仁（?-1652）亦奏請：「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sup>12</sup>因此，順治二年，在全國各地烽火未息，戰局未定的情形下，清廷即舉行首次科舉考試（八月鄉試，次年三月會試），以廣徵天下之才，亦力爭秀民之心<sup>13</sup>。至順治十二年（1655）三月，天下大勢已定，清世祖（1638-1661）下諭禮部進一步闡明：

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自明季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sup>14</sup>

世祖此諭，當是秉承太宗皇太極（1592-1643）早在天聰三年（1629）便欽定的「以文治世，以武克敵」<sup>15</sup>建國方略。

綜上可見，武功以定國基，文治以開太平，關鍵因素則為人心所向，已然是清朝開國君臣的普遍共識。

清聖祖亦深諳民心重要之道，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初八，在與經筵講官熊賜履（1635-1709）對談時即稱：「致治以服人心為本，人心服，更無餘事

<sup>9</sup> 「歷史脈絡化」的概念，受啟發於嚴志雄先生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在上海大學「清代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文辭脈絡化、生命史脈絡化、歷史脈絡化——明清詩文研究的三個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 工作」。特此致謝。

<sup>10</sup> [清] 巴泰等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1987 年），第 3 冊，頁 62。

<sup>11</sup>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10 冊，頁 8088。

<sup>12</sup> 巴泰等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9，頁 168。

<sup>13</sup> 參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vol.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59-61。

<sup>14</sup> 巴泰等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91，頁 712。

<sup>15</sup>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1 冊，頁 27。

矣。」<sup>16</sup>基於此清醒的認識，清聖祖在面對以「共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sup>17</sup>為號召，糾纏著複雜深刻民族矛盾的三藩之亂<sup>18</sup>，能敏銳且準確判斷，（漢）民心向背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於是，在康熙十三年(1674)「大兵進剿逆賊」<sup>19</sup>之際，聖祖便諭示吏部：

頃以需人甚急，已將漢軍內堪用人員照該督撫所請，發往軍前候用。其漢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煩劇者，不拘資格，著漢官大學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據實保舉，發往軍前，與漢軍官員一體并用。務期虛公推薦，有裨地方，以副朕廣攬人才之意。<sup>20</sup>

此諭不加掩飾地表達了要不拘一格廣攬漢族人才的強烈意願。康熙十六年(1677)聖祖進一步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1679)等：「治道首崇儒雅……今四方漸定，正宜振興文教。」<sup>21</sup>顯然，通過三藩之亂，清統治者更清楚意識到：奪天下靠武功，定天下則須文治；文治的根本，同樣在於人心（尤其是漢文人之心）所向。正是在此背景下，清聖祖詔開博學鴻儒科：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親試錄用。<sup>22</sup>

聯繫前述多爾袞「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范文程「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清世祖「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等系列論述以觀之，清聖祖詔開博學鴻儒科的目的，無疑依然是企望化解滿漢對立，爭取漢文人之心<sup>23</sup>，進而文治天下以開太平。然而值得重視的是，其最終目

<sup>1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冊，頁105。

<sup>17</sup> 參〔清〕夏琳：《閩海紀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卷之3，頁86。

<sup>18</sup> 三藩之亂：清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至二十年十月，藉口清廷「撤藩」之議，由吳三桂（平西王）發動，耿精忠（靖南王）、尚之信（平南王）相繼響應，歷時八年、蔓延逾十省的反清戰爭。

<sup>19</sup> 〔清〕馬齊等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卷46，收入《清實錄》，第4冊，頁609。

<sup>20</sup> 同前註。

<sup>21</sup> 〔清〕王先謙：《東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369冊），頁665。

<sup>22</sup>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4冊，頁3192。

<sup>23</sup> 參 David R. McCraw, *Chinese Lyricis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 64。

的，更應是爲了確立滿清政權的正統性、合法性與正當性。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一再強調：「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sup>24</sup>「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竝行於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sup>25</sup>闡述了天子之於治統與聖人之於道統的關係，強調二統相合，互爲興替；治統基於道統，道統制約治統，天子發揚道統，以達天下大治。雖然王夫之的論述是建立在維護華夏文化「正統性」，質疑滿清政權「合法性」的立場上<sup>26</sup>，但這樣一種統治理念及其思維模式，卻與滿清統治者的文治理想相符，便是冀望以其現實掌控的「治統」與漢文人心中固有的「道統」合二爲一，以道統支撐治統，確立與彰顯新朝統治的正統性、合法性及正當性。康熙八年(1669)，聖祖諭示：「朕惟聖人之道，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善俗，莫能外也。」<sup>27</sup>顯然是試圖挾「聖人之道」，以高屋建瓴之勢，推行「興道致治」的文化統治方略。康熙十六年聖祖所作〈日講四書解義序〉更一語道破天機：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sup>28</sup>

聖祖一方面顯示對華夏歷代傑出的治統及道統代表人物推崇備至，一方面儼然宣示爲以治統道統譜系的正統承傳者自居。同時，聖祖還以「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闡明二統合一的必然性，並且強調無論「創業」或「守成」均須尊崇講明二統合一的必要性。事實上，就是企圖以歷史悠久的華夏道統承接甫定天下的新朝治統。這或許正是康熙十八年詔開博學鴻儒科的根本緣由。換言之，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詔開，當是滿清作爲異族入主中原，需要確立其政權爲沿襲合法治統，承續正統道統的歷史迫切性所致。

漢文人士大夫代表人物的反應亦同樣有主動積極的表現。康熙七年(1668)，

<sup>24</sup>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續修四庫全書》第449冊），卷13，頁676。

<sup>25</sup> 同前註（第450冊），卷15，頁35。

<sup>26</sup> 參孔定芳：〈清初朝廷與明遺民關於「治統」與「道統」合法性的較量〉，《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頁189-197；彭傳華：〈正統、道統、治統——王船山對於政權合法性來源的思考〉，《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13年3月），頁16-21轉34。

<sup>27</sup> [清]文慶等：《國子監志》（《續修四庫全書》第751冊），卷首1，頁436。

<sup>28</sup> 馬齊等監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卷70，收入《清實錄》，第4冊，頁899。

熊賜履為世祖所作碑文有曰：「我皇考以道統為治統，以心法為治法。稟天縱之資，加日新之學，宜其直接乎帝王之傳而允躋於三五之隆也。」<sup>29</sup>熊氏時任秘書院侍讀學士，後累遷禮部尚書、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並任《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總裁官，病逝後，諡「文端」。此碑文宣明華夏文化精神支柱的道統為治統（當然包括滿清政權治統）之根基，倡導治統道統合一，從而使滿清統治者承續歷代帝王譜系，並達至比肩三皇五帝時代的盛世。這樣一個思路，也體現於康熙十九年(1680)李光地(1642-1718)在奏章對聖祖的稱頌之中：

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sup>30</sup>

李光地為康熙九年(1670)進士，時任內閣學士，後累官至直隸巡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亦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大家，曾奉敕編纂《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周易折中》等書。李氏在由衷認同及推崇當今天子「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復合二統的內聖外王形象同時，亦表達了繼承發揚華夏文明「五百年而統一續」、「天其將復啓堯、舜之運」的心願與期許。

如果說，復合二統理念的論述，清統治者是基於確立其政權正統性、合法性、正當性的訴求；那麼，漢文人士大夫則是基於延續華夏文化命脈，以及在現實政治環境中生存發展的祈願。而後者，也應是漢文人心態轉變的深層文化底蘊。清廷君臣這種二統合一的論述，當為新朝帝國主流意識的體現。

雖然清初朝野有關二統的論述，亦不乏針鋒相對的角力與較量（尤其在順治朝[1644-1661]）<sup>31</sup>，但隨著清王朝文治的深入實施（尤其在康熙朝[1662-1722]），二統合一的論述在統治者及漢文人中愈趨和諧，並產生了更具實效性的影響。

倘若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清初順、康二朝(1644-1722)對於二統關注的側重點是有所變化：順治朝更多關注的是治統，康熙朝更多關注的是道統。治統關

<sup>29</sup> [清]熊賜履：〈恭擬大清孝陵聖德神功碑文〉，《經義齋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0冊），卷2，頁243。

<sup>30</sup> [清]李光地撰，陳祖武點校：《榕村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冊，頁256-257。

<sup>31</sup> 參孔定芳：〈清初朝廷與明遺民關於「治統」與「道統」合法性的較量〉，頁189-197。

乎政權確立的合法性，道統則繫於文化承續的正統性。順治朝通過武功征服，完成治統歸一，康熙朝則深入為文化上的道統建構；治統原於道統，道統既立，治統便有憑恃<sup>32</sup>。

從范文程上疏提議爭取秀民之心，到清聖祖諭示徵召博學鴻儒，再到君臣／朝野對治統道統合一的強調，可見清初各方有關滿清王朝定鼎中國的正統性、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論述及操作，在在呈現出有跡可循、不無扞格卻亦互為呼應的歷史脈絡化進路<sup>33</sup>。這也彰顯著滿清王朝由武功主導走向文治主導，亦即由治統趨歸道統的合邏輯歷史走向，從而促使滿清王朝由亂世走向盛世。反觀之，也正是在「走向盛世」的進程中，二統合一的文治理想方得以持續的落實與實現。

由此可說，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是「應運而生」的產物——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在最佳的時機以水到渠成的方式而產生。其意義，既體現在「與國運相關」<sup>34</sup>的博學鴻儒制科考試形式，更體現在上承順、康亂局下啓康、乾(1662-1799)盛世<sup>35</sup>的康熙十八年歷史轉捩點<sup>36</sup>。換言之，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所起的作用，當為在三藩未平但勝局已定的歷史轉捩點<sup>37</sup>，以制科考試的形式強化／固化滿清統治者入主中原的長久戰略佈局，進一步確保其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合理性與合法性。這一切得以實現的關鍵，恰在掌握、左右中華道統的漢文士心態的轉變。

<sup>32</sup> 參同前註，頁 194。

<sup>33</sup> 筆者有專文對這一進路進行初步的探討。參拙作：〈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現實目的及歷史意義〉，《長江學術》2015 年第 2 期，頁 32-38。

<sup>34</sup> 孟森〈己未詞科錄外錄〉：「清一代之科目，與國運相關者，莫如制科。」見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494。

<sup>35</sup> 趙剛〈康熙博學鴻詞科與清初政治變遷〉：「康熙十八年，是清朝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上承順治、康熙初年的戰亂局面，下啓康、乾盛世的到來。」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 年第 1 期，頁 90。

<sup>36</sup> 其餘兩次博學鴻儒科並不具備這樣一種時代的發展需要及意義，因此，也就只能落到「無疾而終」與「裝點休明的常態化表現」的結局。

<sup>37</sup> 康熙十七年三月，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國號「周」，改元「昭武」），同年秋病死，形勢陡變，叛軍從此一蹶不振。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兵攻克岳州等地，形勢更急轉直下，清廷勝局遂定。



### 三、漢文人心態漸進而顯著的轉變

從時代大背景來看，清朝定鼎之初便推行一系列旨在恢復經濟，安定社會的措施。到康熙年間已見顯著效果：「自平定以來，人民漸增，開墾無遺。……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遺悞不足之虞。」<sup>38</sup>這是連著明遺民魏禧(1624-1681)也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方今天下休息，年和穀豐，萬里昇平。」<sup>39</sup>黃宗羲(1610-1695)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給時任左都御史的徐乾學(1631-1694)信中，亦給予由衷肯定：「今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非尋常之宜麻，不關世運也。」<sup>40</sup>可知太平盛世，已非妄言。在此，黃宗羲對「名世」、「太平」的肯定，是緣自「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儒者遭遇之隆」的處境。可見聖主下的文治，正是走向盛世的必由之路。

滿清統治者在武功方面的節節勝利，使漢族文人士大夫不得不接受異族入主中原的現實；滿清統治者在文治方面的努力與成就，更是頗為成功地贏取了漢文人的心。Lynn A. Struve 即認為當時漢文人，雖然因前途無定而有憤懣之感，但也對滿清文治（尤指康熙十八年詔開博學鴻儒科與編纂《明史》）及武功有仰慕敬佩之心<sup>41</sup>。蔣寅亦指出康熙朝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天下名士，開館修《明史》，顯示朝野以銳意文治之意，促使士大夫群體逐漸歸心朝廷，開始趨向於對清王朝的認同<sup>42</sup>。早年參與抗清復明活動，「棄制舉，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sup>43</sup>的朱彝尊，在知天命之年卻決意應徵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科，亦當是順應這一時代潮

<sup>38</sup>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聖祖諭旨。見馬齊等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49，收入《清實錄》，第 6 冊，頁 469。

<sup>39</sup> [清]魏禧：〈答翟韓城書〉，《魏叔子文集外篇》（《續修四庫全書》第 1408 冊），頁 448。

<sup>40</sup> [清]黃宗羲：〈與徐乾學書〉，《南雷雜著稿》，收入《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1 冊，頁 67。

<sup>41</sup> Lynn A. Struve, "Ambivalence and Action: 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 in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eds.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1-365.

<sup>42</sup> 蔣寅：〈由古典文學看歷史上的夷夏之辨與文化認同〉，《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6 期，頁 30。

<sup>43</sup> [清]王士禛：〈曝書亭集序〉，收入朱彝尊：《曝書亭集》，頁 3。

流的發展趨勢：「竹垞〔朱氏號〕早年參與復明之舉，中歲之後，時勢已非，乃應博學鴻辭之徵，立文學侍從之列，亦新朝所需孔亟也。」<sup>44</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錄取的五十人中，大半為江南文士<sup>45</sup>。對這一現象的解讀，與其強調得益於學風醇厚，人文薈萃的地域文化優勢，不如矚目其彰顯了當年抗清最烈的江南民心（士心）的轉變。正如 Lawrence D. Kessler 所指出，清廷刻意延攬江南士人參政，有撫慰江南士人的作用，意圖爭取當年抗清活動最為激烈地區的民心<sup>46</sup>。

進入康熙朝中後期，全國政權日趨鞏固，一統大局底定<sup>47</sup>。隨著治統落實，道統發揮作用的迫切性日益顯見，滿清王朝的發展戰略，便從武功主導轉向文治主導。雲集經、史、文學大家的江南文人群體，益發顯示其不容忽視亦難以取代的重要性<sup>48</sup>，文治中心亦呈現出由北方轉向南方的態勢<sup>49</sup>。值得強調的是這一系列歷史重要進展的關鍵性表徵，當為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顯而易見的心態轉變。

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五十人中，朱彝尊被視為指標性人物<sup>50</sup>。朱彝尊於康熙

<sup>44</sup> 啓功：〈朱竹垞〈梧月詞敘〉手稿跋〉，《啓功叢稿·題跋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315。

<sup>45</sup> 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五十名錄用者中，三十九名為江浙人，加上江西二人，南方人占四十一名，北方人只有九名。類似的現象同樣出現在乾隆元年博學鴻儒科。該科所錄十九人（包括乾隆二年補試所錄四人），江浙即十五人，加上江西、福建、雲南各一人，南方人更占十八位，僅一人來自北方的山東。參〔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冊，「考試類」，頁705。這或許就是清高宗在文治方略上承傳清聖祖的表徵之一。

<sup>46</sup> 參 Lawrence D. Kessler,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 (1971): 179-200;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12年），頁8。

<sup>47</sup> 南明永曆帝朱由榔於康熙元年被殺於昆明，張煌言於康熙三年兵敗遇害，清廷在大陸的威脅基本消除；至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軍渡海收復臺灣，清廷一統江山的大局則基本完成。

<sup>48</sup> 據趙剛統計分析，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後，「近兩個世紀中，南方（尤其是江南）士紳始終居於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康熙朝的167名南書房入值大臣和翰林院掌院學士中，江、浙兩省70人，占60%；康熙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的74名漢族大學士，江、浙占一半，與順康之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康熙博學鴻儒科與清初政治變遷〉，頁96）。

<sup>49</sup> 參拙作：〈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現實目的及歷史意義〉，頁32-38；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p. 436-447; Silas H. L. Wu,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83-105。

<sup>50</sup> 陸隴其：「朱錫鬯，朝廷屢問及，于薦舉諸人中，最為赫然。」見〔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上，頁38。

二十八年(1689)對自己赴試博學鴻儒科之舉有所愧疚：「予之出，有愧於先生〔指黃宗羲〕。」<sup>51</sup>亦有論者指出：「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後，〔朱彝尊〕編刻入京以來詩文，特意題作『騰笑集』，蓋取孔稚圭〈北山移文〉『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詭』語，以寓自嘲之意。」<sup>52</sup>儘管如此，且看朱彝尊在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試所作〈御試省耕詩二十韻〉的表示：

長樂虬鐘啓，端門羽仗排。良辰元已近，暄景暮春佳。

帝念勤民切，群情望幸皆。……

吉日宣王禱，空同軒后齋。星躔齊北拱，聲教已南諧。

曲渚宜浮洛，芳尊迥勝淮。宸游多悅豫，振旅入天街。<sup>53</sup>

對新朝歌功頌德之態畢現，試與朱氏作於順治三年(1646)的〈悲歌〉比較：「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熒熒曠野。」<sup>54</sup>其心態可謂判若雲泥。

舉博學鴻儒科後，朱彝尊的臣子之心更袒露無遺：「臣伏見皇上即阼以來，仁聲溥洽……臣雖蒙滯，躬逢盛際，於以頌揚丕烈，其何敢後？」<sup>55</sup>「元老傳天語，殊恩及侍臣」<sup>56</sup>，「本作漁樵侶，翻聯侍從臣」<sup>57</sup>，「群臣歸燕息，轉念聖躬勞」<sup>58</sup>，「小臣逢盛際，獻頌愧無文」<sup>59</sup>。正因如此，即使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彝尊遭劾，謫官歸里，仍可「後數年，〔聖祖〕駕巡河上，至江浙，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于昔時也」<sup>60</sup>。不是竭誠盡忠的老臣，哪能有如此「無替于昔時」的「禮遇之隆」<sup>61</sup>？

與朱彝尊同屬「以布衣擢用」<sup>62</sup>的李因篤及潘耒也很有代表性。李因篤明亡

<sup>51</sup> 朱彝尊：〈黃徵君壽序〉，《曝書亭集》，頁341。

<sup>52</sup> 蔣寅：〈遺民與貳臣：易代之際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擇——以明清之際為中心〉，《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9期，頁36。

<sup>53</sup> 朱彝尊：《曝書亭集》，頁118。

<sup>54</sup> 同前註，頁49。

<sup>55</sup> 朱彝尊：〈平蜀詩十三章序〉，同前註，頁120。

<sup>56</sup> 朱彝尊：〈是夜賜內紵表二裏一〉，同前註，頁125。

<sup>57</sup> 朱彝尊：〈二十日召入南書房供奉〉，同前註。

<sup>58</sup> 朱彝尊：〈皇仁綏遠詩八首〉其一，同前註，頁155。

<sup>59</sup> 朱彝尊：〈皇仁綏遠詩八首〉其八，同前註，頁156。

<sup>60</sup> 〔清〕陳廷敬：〈皇清敕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竹垞朱公墓誌銘〉，收入同前註，頁600。

<sup>61</sup> 參 David R. McCraw, *Chinese Lyricis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87-89。

<sup>62</sup> 參〔清〕李集輯，〔清〕李富孫、李遇孫續輯：《鶴徵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23冊），卷1，頁569。

後所作詩，多抒發「故國浮雲外，中原蔓草中」<sup>63</sup>，「胡爲兵戈中，築堞失完土」<sup>64</sup>之類的故國哀思；康熙十八年卻入選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足二月便疏乞終養而歸鄉。此舉被當今學者譽爲「明代遺民之風範」<sup>65</sup>。其實，從李因篤離京返鄉之際所表述「聖恩深重容歸養，歧路褰裳露未乾」<sup>66</sup>，「帝性孝且仁，深宮照無忒」<sup>67</sup>等詩句看，已非遺民心態。潘耒雖是博學鴻儒中年紀最輕者，卻是堅拒徵詔的大儒顧炎武(1613-1682)的門生，其兄潘耒章(1626-1663)因《明史》案被凌遲，有遺詩曰：「從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sup>68</sup>潘耒早年的作品，常見諸如「男兒志四方，荏苒愁歲暮」<sup>69</sup>，「〈西征〉賦就何人賞，焚向東風血淚班」<sup>70</sup>之類秉持氣節高抗不屈的情狀，舉博學鴻儒後所作詩文卻有「文獻日以淪，我皇敦文教」<sup>71</sup>，「微臣幸生雍熙之代，爲侍從之臣，預在末班，遭逢曠典，豈可使鴻休盛美鬱而不宣？雖規天畫日，難爲光容；而拊缶擊輦，有應〈風〉、〈雅〉」<sup>72</sup>之類堂而皇之的歌功頌德，如此反差之大的轉變，當是基於在心態上對新朝文治成就的認可與和樂昇平盛世的服膺。

博學鴻儒中最年長的尤侗爲宋琬(1614-1674)的《重刻安雅堂文集》作序稱：

況以先生之才，天將磨礪其筋骨，冰雪其聰明，使之升歌〈雅〉、〈頌〉以鳴本朝之功德，即今天子開三館，以脩一代之史，昌黎復起，舍先生奚適矣！<sup>73</sup>

63 [清]李因篤：〈程義士嬰墓〉，《受祺堂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8冊），卷7，頁519。

64 李因篤：〈良鄉〉，同前註，卷8，頁527。

65 楊海英：〈康熙博學鴻儒考〉，《歷史檔案》1996年第1期，頁99。

66 李因篤：〈留別詹事大兄〉其三，《受祺堂詩》，卷21，頁668。

67 李因篤：〈留別吳侍講臥山〉，同前註。

68 [清]黃人：《大獄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14冊，頁664，「臨野堂別集」條。

69 [清]潘耒：〈送顧季貞之豐縣〉其四，《遂初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17冊），卷1，頁181。

70 潘耒：〈西泠展墓〉其二，同前註，卷2，頁190。

71 潘耒：〈監修徐立齋學士見示途中寄兩總裁暨諸同館詩用韻奉和〉其一，同前註，卷3，頁205。

72 潘耒：〈賜宴瀛臺詩序〉，同前註，卷4，頁214-215。

73 [清]尤侗：〈重刻安雅堂文集序〉，收入[清]宋琬：《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98-99。

尤侗為江蘇長洲（今吳縣）人，明末秀才，順治初以貢生謁選永平推官，後得罪權貴而辭官歸里，自號「晦庵」；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三年後告老辭歸。宋琬為山東萊陽人，父宋應亨（?-1643）遇害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清兵陷萊陽時。宋琬有詩追憶：「一朝變起塵沙飛，老親白首同日歸；骨肉摧殘那忍道，餘生孤子將疇依。」<sup>74</sup>字裏行間顯見哀傷沉痛之情。然而，短短三年後，在「小試爭奪赤羽旗，揮毫競奪中原幟」<sup>75</sup>的入世精神、「人皆意其騰達必蚤」<sup>76</sup>的社會期待與「應詔公車解褐衣，勉尋升斗羞卑瑣」<sup>77</sup>的現實需求驅動下，宋琬不得不「承明需射策，莫戀故山薇」<sup>78</sup>，於清順治三年參加鄉試並奪亞魁（第六名），翌年中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順治七年（1650）被誣告與義軍通而下獄，康熙二年（1663）釋放後長期投閒置散；康熙十一年（1672）重被起用，任四川按察使；次年入京覲見，逢吳三桂（1612-1678）亂，憂病卒於京。「升歌雅頌以鳴本朝之功德」，不僅表達尤侗的心態立場，還說明宋琬至少在康熙十二年逝世前的文集，已表現出為滿清王朝歌功頌德的態度與傾向。

曾經隱居著述九年後，於康熙十八年獲名臣陳廷敬（1639-1712）推薦而舉博學鴻儒的汪琬的一段話，亦充分顯示出對滿清新朝不無由衷的歌頌：

自我世祖定鼎以來，文治聿興，於是聲教所被，時則常熟錢尚書謙益、太倉吳祭酒偉業、宛平王文貞公崇簡、合肥龔端毅公鼎孳，以文學宣導於前，然後鴻儒碩士，望風繼起，迄於今上在御，益加網羅海內英雋，彬彬蔚蔚，麟次集於朝廷之上，大之發為詔誥，小之散為詩歌，繪繡錯施，詔濩並作。<sup>79</sup>

汪琬對新朝「文治聿興」、「聲教所被」的文治方略、「海內英雋，彬彬蔚蔚」的文壇盛況，以及「繪繡錯施，詔濩並作」的文學成就，給予充分的肯定與讚

<sup>74</sup> 宋琬：〈長歌寄懷姜如須〉，同前註，頁380。

<sup>75</sup> 宋琬：〈題〈松鶴圖〉為仲兄五十壽〉，同前註，頁227。明亡後終生隱居不出的魏禧，亦不排斥進取用世：「士君子生際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遺世獨立。」見魏禧：《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45。

<sup>76</sup> [清]王熙：〈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誌銘〉，[清]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冊，卷78，頁2226。

<sup>77</sup> 宋琬：〈長歌寄懷姜如須〉，頁381。

<sup>78</sup> 宋琬：〈送東雲離孝廉〉其一，同前註，頁248。

<sup>79</sup> [清]汪琬：〈苑西集序〉，《堯峰文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四部叢刊初編》），卷28，頁243。

揚，完全可視為對前引聖祖徵召博學鴻儒上諭的積極回應。這無疑顯示了在康熙朝中後期統一、繁榮、強盛的新時代氣氛下，漢族文人士大夫的心態產生了巨大的轉變。前引與汪琬同舉博學鴻儒的尤侗和潘耒，所云「升歌〈雅〉、〈頌〉以鳴本朝之功德」與「豈可使鴻休盛美鬱而不宣」，亦顯然是體現了同樣的心態。

尤侗雖然在錄用後居三年即告歸，但康熙三十八年(1699)及四十二年(1703)，聖祖南巡，尤侗皆獲召見侍講殊榮，並獲「御書『鶴栖堂』扁額以賜」，可謂「受聖主之知」<sup>80</sup>。同舉博學鴻儒的徐鉉「既入翰林，會忤權貴意，當外轉，遂拂衣歸；上南巡，兩賜御書」<sup>81</sup>。早年曾參加武裝抗清鬥爭的毛奇齡，後來不僅於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更於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時，雖已休致多年，仍多次迎駕、拜謁，亦因此獲賜御書一幅。朱彝尊被劾後，為同舉博學鴻儒的好友嚴繩孫(1623-1702)「遭逢盛際」、「侈陳盛事」的《瀛臺侍直詩》作序，仍不失表忠頌美之心<sup>82</sup>。嚴繩孫從開始百般辭薦，中選入史局初揭陶淵明(365?-427)〈歸去來辭〉於壁以明志，兩年後選充日講起居注官，卻頓感知遇之恩<sup>83</sup>，至康熙二十三年乞歸獲准時，即填〈南鄉子〉詞云：

月滿漁村，一道飛書下九閭。聖主臨軒初試日，逡巡，白髮青衫謁至尊。隱矣又焉文，歸去空留土木身。何意片詞親簡自楓宸，九死從今總負恩。<sup>84</sup>

短短幾年間，嚴繩孫對待清統治者的態度前後相比，可謂判若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提到的李因篤、尤侗、汪琬、朱彝尊、徐鉉、毛奇齡、嚴繩孫，皆於舉博學鴻儒後，相繼以不同理由去官歸里，他們的表現顯然跟歷史上抗拒與統治者合作的傳統隱士大不一樣。這個現象，當可解讀為此類漢文人發自內心歸順滿清新朝的態度。這種發自內心的歸順態度，正是在「民心（秀民之心）所向」的層面，呼應並彰顯了滿清朝廷文治的終極目標——確立新朝統治的正統性、正當性及合法性。

由此也可以理解，清廷修《明史》，除了籠絡文人之心，還應有對其政權正

<sup>80</sup> 朱彝尊：〈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曝書亭集》，頁572。

<sup>81</sup> [清]秦瀛：《己未詞科錄》（《續修四庫全書》，第537冊），卷3，頁153。

<sup>82</sup> 朱彝尊：〈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曝書亭集》，頁315。

<sup>83</sup> 參孔定芳：《清初遺民社會》（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33。

<sup>84</sup> [清]嚴繩孫：《秋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33冊），卷10，頁615。

統性、正當性及合法性的關注與焦慮<sup>85</sup>。事實上，歷來改朝換代，新朝為前朝修史，即有宣示承襲王朝正朔之意。故滿清鼎革之初，於順治二年，即設館修纂《明史》，然而過於倉促，最終不了了之。康熙十八年所錄五十名博學鴻儒，便悉數遣修《明史》，以為其時文治的重大舉措；康熙朝所修《明史》將明代滅亡時間定為崇禎十六年，不承認南明(1644-1662)的歷史地位，即有以此彰顯滿清延續正朔王朝的正統性、正當性及合法性之意。乾隆初年李天根編纂的《燭火錄》記載南明諸政權史事，紀年皆用清朝年號，聲稱：「是編編年，頂格大書『大清順治元年』，尊正統也。」<sup>86</sup>此舉顯示清廷借修史確立其政權正統性、正當性及合法性的努力已產生實效。據此亦可說，清廷讓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悉數參與修《明史》，實際上便是使漢文人（在心態與行為上）參與了確立、構建新朝政權正統化與合法化的過程。

當然，對滿清新朝採取不合作態度者亦大有人在，代表性人物無疑為顧炎武與黃宗羲等。

順治初年，「大半伏處草間」的晚明社局中人，亦已「盡出而應秋試」<sup>87</sup>。這種現象儘管受到時人賦以「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sup>88</sup>的譏嘲，但也由此顯見時局紛亂之際，勝國士子心態浮動於糾結困頓之中。時至康熙年間，顧炎武等人的表現更為耐人尋味。如顧炎武雖然曾喟歎參與博學鴻儒科的文人「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sup>89</sup>，仍將入榜者視為知己：「同榜之中相識幾半，其知契者，愚山（衍生注：施閏章）、荊峴（湯斌）、鈍庵（汪琬）、竹垞（朱彝尊）、志伊（吳任臣）、阮懷（高詠）、蓀友（嚴純蓀）。」<sup>90</sup>並對博

<sup>85</sup> 參蘇循波：〈清修《明史》與政治合法性的建構〉，《求索》2013年第3期，頁67-70。

<sup>86</sup> [清]李天根撰，倉修良，魏得良校點：〈凡例〉，《燭火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冊，凡例頁1。

<sup>87</sup> [清]杜登春：《社事始末》，《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642。

<sup>88</sup> [清]儲人獲：《堅瓠五集》卷三「一隊夷齊」條：「皇朝初定鼎，諸生有養高行遜者。順治丙戌再行鄉試，其告病觀望諸生，悉列名與考。滑稽者作詩刺之曰：『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喫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聞者絕倒。」載於劉獻廷等：《清代筆記叢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2冊，頁1038。

<sup>89</sup> [清]顧炎武：〈廣宋遺民錄序〉，《顧亭林詩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卷2，頁33。

<sup>90</sup> 顧炎武：〈答李子德〉，同前註，卷4，頁74-75。

學鴻儒參與修史給予充分肯定：「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sup>91</sup>黃宗羲的表現似乎更有與時俱進的意味。雖然黃宗羲始終不仕清，卻也遣兒子黃百家(1643-1709)及門人萬斯同(1638-1702)參加修《明史》，並明確表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輩之手，勿使淆亂，白衣從事，亦所以報故國也。」<sup>92</sup>其門人萬斯同在受徐乾學纂修《明史》之聘時亦表白：「吾此行無他志，顯親揚名非吾願也。但願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報先朝矣。」<sup>93</sup>

黃宗羲、萬斯同等以修史辨是非，寄寓先朝故國之思，清聖祖同樣以修史辨是非，卻是昭示收服人心之意。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二十六日，聖祖為修《明史》事作文一篇，命曉諭諸臣，其文有曰：「《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sup>94</sup>從黃百家、萬斯同等人的參與編修《明史》的行為表現看，清聖祖的意圖事實上已相當程度達成。「嶺南三大家」之一，早年曾參與抗清鬥爭的陳恭尹(1631-1700)，對聖祖修《明史》更給予極高評價：「今天子賡歌喜起，宸翰雲飛，史局宏開，徵書雨至。青陽布令，百草懷自見之心；白日中天，暗谷有容光之地。」<sup>95</sup>字裏行間，顯見陳恭尹對「今天子」不加保留的恭順頌美之心<sup>96</sup>。

黃宗羲文集中，亦不乏對清統治者的稱頌之語。如〈餘姚縣重修儒學記〉有「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sup>97</sup>；〈周節婦傳〉有「今聖天子，無幽不燭」<sup>98</sup>；在〈陳夔獻墓誌銘〉中，黃宗羲更以讚賞之辭，描述康熙十九年漢文人在聖祖文治感召下積極出仕的現象：「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嫻一藝者，莫不

<sup>91</sup> 顧炎武：〈與史館諸君書〉，同前註，卷3，頁53。

<sup>92</sup> [清]黃嗣艾：〈萬石園先生〉，《南雷學案》卷7，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26冊，頁462。

<sup>93</sup> [清]楊天咎：〈萬季野先生墓誌銘〉，收入[清]萬斯同：《石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頁441。有關萬斯同參與修《明史》的意義，參張麗珠：〈「一代賢奸托布衣」——萬斯同之明史修撰與浙東史學的聯繫〉，《成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9年7月），頁45-47轉49-84。

<sup>94</sup> 姜勝利：《清史紀事本末》第三卷（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764。

<sup>95</sup> [清]陳恭尹：〈重刻嶺南文獻徵啓〉，《獨漉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13冊），卷8，頁269。

<sup>96</sup> 參王富鵬：〈論明遺民對清政權的接受和認可——以陳恭尹交遊的轉變過程為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4期（2009年7月），頁47-51。

<sup>97</sup> 黃宗羲：《南雷文定》（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三集》，卷1，頁16。

<sup>98</sup> 同前註，卷2，頁44。



鎖廳而出。」<sup>99</sup>以科舉考試招取琴釣歌牧之隱逸才士，為清聖祖文治的重要舉措之一；而「莫不鎖廳而出」的成功效果，顯見此舉措深得勝國才士之心。黃宗羲如此描述，表明對清廷文治及文士出仕的雙重肯定，從根本上說，亦表明了其心態的重大轉變。

黃宗羲心態轉變的關鍵時間點，或許就在康熙十八年前後。黃宗羲《南雷文約》和《南雷文定》中的墓誌與行狀，康熙十八年前所作用干支紀年，康熙十八年後所作，基本上都冠以清朝年號<sup>100</sup>。黃宗羲以康熙十八年為界改變紀年方式，顯示其心態的變化，當與該年博學鴻儒科試（及後續修《明史》）的政治文化氛圍有頗為直接的關係。由此可見，隨著文治的深入，黃宗羲已對滿清王朝採取明確的認可態度了。

就清初政治文化生態整體而言，清初漢文人心態固然因不同時空不同個案，會有頗為複雜多樣的表現<sup>101</sup>；尤其是已然為新朝寵渥的博學鴻儒，與始終不仕新朝的黃宗羲等亦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作為漢文人群體立足於不同立場的指標性人物，在康熙十八年前後，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新朝文治的深入發展，確實均殊途同歸地呈現出雖不同程度卻也漸進而顯著的心態轉變。

概言之，召舉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的意義，從滿清統治者方面來說，需要的不僅是遺民其人，更是其心態的轉變。因此，對於錄用者，是否重用、長用反倒不重要，重要的是配合新朝的文治順利實施，以求政權牢固確立。對於不合作者，清廷寬厚以待，授以榮銜<sup>102</sup>；然而一旦觸犯到其政權正統性、合法性的生命線，便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打擊<sup>103</sup>。康熙朝後期的《南山集》案即可為例說明。

<sup>99</sup> 同前註，《後集》，卷3，頁50。

<sup>100</sup> 參郭英德：〈黃宗羲的人生定位與文化選擇——以清康熙年間為中心〉，收入陳平原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38。

<sup>101</sup> 參謝正光：〈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漢學研究》第17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31-60；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頁291-324；高蓮蓮：〈遊幕與清初士人心態及詩風演變——以康熙己未博學鴻儒科布衣處士士人群為考察對象〉，《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2012年9月），頁55-59；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sup>102</sup> 如傅山與杜越雖抵京，卻拒不參試，仍獲授予中書銜。參姜勝利：《清史紀事本末》，頁837。

<sup>103</sup> 由此亦可見，在道統治統合的論述與實施過程中，清統治者的自我身分認同意識一直是十分強烈且頑固，不宜簡單地以傳統漢化論的文化涵化說解讀之。參楊念群：〈超越「漢

康熙四十一年(1702)，戴名世(1653-1713)的弟子龍雲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由於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為「南山集偶鈔」（即《南山集》）。康熙五十二年(1713)，《南山集》案發，此為聖祖親政後處理的最大文字獄，關鍵的罪名即戴氏在《南山集》中直書南明弘光(1645)、隆武(1645-1646)、紹武(1646-1647)、永曆(1647-1662)、定武(1648-1661)諸帝年號。這就直接觸犯了清朝統治正統性、正當性及合法性的最敏感政治神經生命線。事實上，當時戴名世已改變早年的不合作態度，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參加會試中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參與《明史》編纂。此案表明「正統性」、「正當性」及「合法性」是清統治者的生命線（亦即文治的終極目標），戴氏犯此大忌，即使入仕效忠仍慘遭身亡家毀之禍；涉案的文壇大家方苞(1668-1749)則得聖祖硃諭「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獲從寬處理，不久即以白衣入值南書房，後移值蒙養齋，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更出任武英殿修書總裁<sup>104</sup>。由此案，一方面顯見漢文人在易代之際，畏於權勢又意圖僥倖之難處、苦處，及現實利害動輒得咎之困境；另一方面，亦可窺見清統治者在強烈且頑固地堅守其民族統治絕對權益的同時，亦仍堅持施行文治，表現出爭取（漢文人）民心的企圖與努力。其實，早在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試中，汪琬與毛奇齡卷均疑有影射意，清聖祖竟亦曲為通融，不以為忌；汪、毛二人還分別以名列一等及二等入榜，史家為之慨歎「可見當時試例之寬」<sup>105</sup>。

事實上，康熙初年的《明史》等案，都是在鼇拜(1610?-1669)等輔政大臣處理下，以「悖逆」等重罪受到嚴厲懲處；聖祖於康熙六年(1667)親政前夕，親自處理《啓禎兩朝遺詩》案時，則以「棄市」酷刑重懲告訐者，卻寬待心懷故國的漢族士子<sup>106</sup>。相比之下，顯見聖祖的寬容大度，以及爭取士民之心的意圖。

由此可說，即使在文字獄的處理上，清聖祖還是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並未放棄爭取文人之心及堅持文治的方略。亦因此，至康熙朝中後期，漢文人無論以什麼理由入仕，無論仕途際遇好壞，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文治方略的貫徹與

---

化論」與「滿洲特性論」：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頁116-124。

<sup>104</sup> 參〔清〕蘇惇元輯：〈方苞年譜〉，收入〔清〕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下冊，頁875-878；楊鳳城等：《千古文字獄：清代紀實》（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頁41-56。

<sup>105</sup> 徐珂：《清稗類鈔》，第2冊，頁708。

<sup>106</sup> 參楊鳳城等：《千古文字獄：清代紀實》，頁14-21、25-27。

深入，大都完成了心態的轉變；即使行為不合作者，心態不同程度的轉變也是顯而易見。正是這樣一種漸進而顯著的心態轉變，切實彰顯了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意義及其對詩詞發展的影響。

#### 四、觀念·精神·風格：清初詩詞的發展變化

有論者云：「康熙之制科，在銷兵有望之時，正以此網羅遺賢，與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內漠視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傑者以作興之。」<sup>107</sup>所謂「網羅遺賢」當為虛，「與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內漠視新朝之意」當為實，即著重於確認漢文人通過心態轉變，對新朝法理正統的認可與遵奉（共天位）。事實上，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涉及者大多本來已有功名，甚至已入仕途<sup>108</sup>，Willard J. Peterson 即認為，博學鴻儒科的目的是藉以恢復整個帝國的和平與信心，並非僅是籠絡南明士人<sup>109</sup>。因此，聖祖詔舉博學鴻儒的動機，更應該是對既有的漢文人效忠者進行體制化、典範化。若從應舉博學鴻儒科的士人動機角度考察，則當為表忠新朝，內化體制。其客觀效果亦為漢士人心態／立場／身分的轉型與確認基本完成，「首崇滿洲」<sup>110</sup>為本，「崇儒重道」<sup>111</sup>為用的國策大抵底定，武功主导向文治主導的戰略轉型已然基本實現，誠如啓功所云：「己未詞科，實文治幹運之鈞樞。」<sup>112</sup>

儘管如此，若從現實政治層面來看，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基本上還只是政治性操作，為滿清貴族入主中原、統治全國所考量；政治意義大於文化意義，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相比之下，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對詩詞發展的影響，卻有頗具實質性的現實文化意義。具體而言，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影響，進一步促使文人心態的轉變，從而導致詩詞頗為全面的發展變化：詩詞觀念上，由「窮而後工」轉

<sup>107</sup>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下冊，頁424。

<sup>108</sup> 參趙剛：《康熙博學鴻詞科與清初政治變遷》，頁90-96轉43。

<sup>109</sup> Willard J. Pe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682)," Part I & Part I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 (1968): 114-156, and 29 (1969): 201-247;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頁8。

<sup>110</sup> 清順治帝語。參巴泰等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卷72，收入《清實錄》，第3冊，頁570。

<sup>111</sup> 順治十年四月，禮部遵旨將崇儒重道定為基本國策。參同前註，卷74，頁585。

<sup>112</sup> 啓功：《朱竹垞家書卷跋》，《啓功叢稿·題跋卷》，頁314。

向「達而後工」<sup>113</sup>；創作精神上，由「諷喻批判」轉向「歌功頌德」；風格形態上，由「幽愁慷慨」轉向「睿藻炳然」。

「窮而後工」，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自古以來一個重要的創作現象；自從唐代韓愈(768-824)的「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sup>114</sup>，和宋代歐陽修(1007-1072)的「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sup>115</sup>，相繼從理論上加以總結闡述後，「窮而後工」更進一步成爲重要的詩歌創作準則，以及對後世詩歌創作影響深遠的觀念。

清初早期，「窮而後工」說仍頗爲盛行，呈現出顯而易見的歷史延續性：「詩窮而後工。詩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sup>116</sup>「必愁且窮矣，而後益工」<sup>117</sup>，「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sup>118</sup>。在明末清初易代鼎革之際，文人士大夫之「窮」，無疑融匯了更多的社會與時代因素，最典型者莫如張煌言(1620-1664)所云：

甚矣哉！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也……雲霖與予論國事之廢興，悲滄桑之變易，感入心脾……是何其思深入，其情沈也。工固至此哉！觀止矣！然後知愁苦之音，果勝於懽愉之詞也。<sup>119</sup>

張煌言如此強調「國事之廢興，滄桑之變易」和詩歌創作之「工」的關係，是由於他本人就是當時著名的抗清義軍領袖，在南方各地堅持抗清活動近二十年，最後被俘就義，其詩作充分表現了易代之悲，滄桑之痛。

到了康熙年間，隨著文治主導趨向盛世的發展，「達而後工」說日漸顯露、張揚：

<sup>113</sup> 有關該議題的較完整闡述，參 Lijian Wang, "Da Er Hou Gong 達而後工: A Literary Concept as a Result of the Flourishing Time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662-1722)," *Ming Qing Yanjiu* 《明清研究》(2001): 115-142。

<sup>114</sup> [唐]韓愈：〈荊潭唱和詩序〉，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冊，頁129。

<sup>115</sup> [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同前註，頁130。

<sup>116</sup>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馮定遠詩序〉，《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冊，頁939。

<sup>117</sup> [清]陳維崧：〈西樵炊聞語序〉，《陳迦陵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卷2，頁28。

<sup>118</sup> [清]納蘭性德：〈填詞〉，《飲水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第72冊），頁48。

<sup>119</sup> [清]張煌言：〈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張蒼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3-5。

漢之盛也，柏梁之體，暢於枚、馬；唐之盛也，開元之風，創於燕、許。其後才人不遇，棲遲草澤，相為幽愁慷慨之音，以自鳴其不平，而說者遂有詩能窮人之論。嗚呼！此豈詩之故哉？言詩，於今日可謂盛矣！予觀朝廷之上，公卿大夫率多光明俊偉，喜為文章，以表見於世。而一時騷人墨客，承風附景，步趨恐後，此詩教在上之應也。<sup>120</sup>

今天子右文興治，揮弦解慍，睿藻炳然。公卿大夫，精心好古，詩律之高，遠邁前代；而以其餘業溢為填詞，歌酬贈，纍有篇什，駸駸乎方駕兩宋。嗚呼，其盛矣！<sup>121</sup>

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尤侗所云，顯然是以漢唐之盛映襯當時之盛。至於宋榮，雖非博學鴻儒，卻深得聖祖信任且重用，於康熙三年(1664)授黃州通判，累擢江蘇巡撫，官至吏部尚書；先後獲聖祖賜御書逾二十種，致仕陛辭時，更獲賜御乘黑棗騮馬以及石硯、玻璃匣、玻璃盤、玻璃酒杯、玻璃蓋盃等珍稀之物<sup>122</sup>。由此可見宋榮深得聖祖恩寵，實可謂「遭逢盛世，躬被主知」，「聖天子非常之榮遇」<sup>123</sup>。如此君臣關係，朱彝尊稱之為「比於股肱、耳目、腹心」<sup>124</sup>，「魚水君臣古不如」<sup>125</sup>；汪琬稱之為「出為股肱之臣，入必為心膂」<sup>126</sup>。尤侗與宋榮皆認為在「右文興治」的太平盛世，文人騷客多為光明俊偉的公卿大夫，他們詠歌酬贈的作品，當是「睿藻炳然」的盛世之音。換言之，文人士大夫因「達」而「以其餘業溢為」詩詞作品，所言者，便絕非「幽愁慷慨之音」。在此，文治→盛世→公卿大夫→詩詞「睿藻炳然」，構成密不可分，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鏈，於是，便從根本上排斥了「窮而後工」之論<sup>127</sup>。

與詩學相比較，詞學中的「達而後工」說更為徹底：「詩能窮人，非篤論

<sup>120</sup> 尤侗：〈龔宗伯詩序〉，《尤西堂雜俎》（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卷上，頁64。

<sup>121</sup> [清]宋榮：〈瑤華集序〉，收入[清]蔣景祁：《瑤華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730冊），頁2。

<sup>122</sup> 參宋榮：《西陂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3冊，卷25，頁1-8。

<sup>123</sup> 宋榮：〈御書恭紀四〉，同前註，卷25，頁6。

<sup>124</sup> 朱彝尊：〈迎鑾集序〉，見同前註，第1冊，〈舊刻詩詞及新編文稿各序〉，序頁20。

<sup>125</sup> 朱彝尊：〈題宋中丞《迎鑾集》〉其一，《曝書亭集》，頁198。

<sup>126</sup> 汪琬：〈綿津山人集序〉，收入宋榮：《綿津山人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5冊），頁440。

<sup>127</sup> 參拙著：《清代文學跨域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頁47-48。

也。至於詞尤不然。……由斯以譚，豈惟詞不能窮人，殆達者而後工也。」<sup>128</sup>詞之所以有如此表現，是由於其「娛賓遣興」<sup>129</sup>的基本功能迎合了太平盛世的需求：「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懽愉之辭，工者十九……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sup>130</sup>「學士朝朝染翰者，皆黼黻太平景象，有謂懽愉之詞難工者，謬也。」<sup>131</sup>於是，這種由「窮而後工」向「達而後工」的觀念轉變，反映在創作精神上，便是由「諷喻批判」轉向「歌功頌德」，歸根結底，無疑就是得益於前述康熙年間走向盛世的大時代背景。

康熙十七年，赴京應博學鴻儒科試的蔣景祁(1646-1695)曾感慨：

古之作者，大抵皆憂傷怨排不得志於時，則托為倚聲頓節，寫其無聊不平之意。今生際盛代，讀書好古之儒，方當銳意向榮，出其懷抱，作為雅頌，以黼黻治平，則吾荊溪之人之文不更可傳矣乎？而詞之選不亦可以已乎？<sup>132</sup>

可見，「生際盛代」，「讀書好古之儒」雖然同樣是本之性情出其懷抱，但其文學精神已自覺由「寫其無聊不平之意」的抒發轉向「以黼黻治平」的頌揚。

這類作品，往往體現「達而後工」的唯美表現。換言之，「達而後工」說尤其強調作品之「工」與文辭形式美的密切關係。在這個意義上，「達而後工」可謂特殊的唯美形式理論。其特殊性，在於不僅以「工」提倡詩歌形式美，還以「達」強調此形式美賴以產生的時代特質——太平盛世<sup>133</sup>。或因如此，康熙十八年後朱彝尊論文尤為推崇唯美風格：「風格流麗」<sup>134</sup>，「雍容典雅」<sup>135</sup>，「美

<sup>128</sup> 尤侗：〈三十二芙蓉詞序〉，《尤西堂雜俎》，卷上，頁60。

<sup>129</sup> 北宋陳世脩為五代馮延巳《陽春集》作序有云：「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宋〕陳世脩：〈陽春集序〉，收入張惠民編：《宋代詞學資料匯編》〔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88）由此可知，詞體創作自始便有娛賓遣興的基本功能。

<sup>130</sup> 朱彝尊：〈紫雲詞序〉，《曝書亭集》，頁332。

<sup>131</sup> 〔清〕沈雄編纂，〔清〕江尚質增輯：《古今詞話》（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詞評》，卷下，頁37，引汪枚評高士奇〈蔬香詞〉語。

<sup>132</sup> 蔣景祁：〈荊溪詞初集序〉，〔清〕曹亮武、蔣景祁、潘眉合輯：《荊溪詞初集》（清康熙十七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卷首，頁3。

<sup>133</sup> 參 Lijian Wang, "Da Er Hou Gong 達而後工: A Literary Concept as a Result of the Flourishing Time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662-1722)," pp. 133-136。

<sup>134</sup> 朱彝尊：〈胡參議轉漕雜詩序〉，《曝書亭集》，頁319。

<sup>135</sup> 朱彝尊：〈石園集序〉，同前註，頁317。

哉！篇章之工且富也」<sup>136</sup>。有意思的是對於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考卷，朱彝尊賞識的也正是唯美風格：「纔纔千言，賦詩皆極瑰麗！」<sup>137</sup>或許這即是呼應清聖祖詔諭所謂「文藻瑰麗」<sup>138</sup>的要求。此現象與其說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毋寧說是以美文讚頌盛世已成爲清初朝野上下的共識。這樣一種共識，在宋犖〈三家文鈔序〉得到頗爲充分的表述：

世祖章皇帝甫定中原，即隆文治，一時元夫鉅公以雄文大冊黼黻治具者，類不乏人。迨今上躬天縱之聖，奎章宸藻，炳耀區區，風聲所被，文學蔚興。上之卿大夫侍從之臣，下之韋布逢掖，爭作爲古文詩歌，以鳴於世。繪繡錯采，詔漢以間，此本朝之盛。所以跨宋軼唐，夔乎其不可及也。<sup>139</sup>

在此，聖君、定鼎、文治、盛世、美文之間的邏輯關係，已緊密無間地連接起來。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春，即三藩之亂平定後翌年，清聖祖特於乾清宮賜宴群臣，「君臣一體，共樂昇平，同昭上下泰交之盛」<sup>140</sup>，暢飲極歡，君臣用柏梁體共賦〈昇平嘉讌詩〉，得詩九十三韻。聖祖製〈昇平嘉讌詩序〉云：

今際海內宴安，兵革偃息，首春令序，九陌燈輝，豐穰有徵，吾民咸樂。思與諸臣欣時式燕，爰於乾清宮廣集簪裾，肆筵授几。斯時也，蟾光鰲炬，焜耀堂廉，絲樹瓊葩，雜羅樽俎。許笑言之勿禁，寬儀法之不糾……宜共成篇什，以紹《雅》、《頌》之音。朕發端首倡，倣柏梁體，班聯遞賡，用昭昇平盛事，冀垂不朽云。<sup>141</sup>

該詩首四句即是：「麗日和風被萬方，卿雲爛熳彌紫闈。一堂喜起歌明良，止戈化洽民物昌。」除了聖祖發端爲首句外，其餘三句分別爲內閣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納蘭明珠(1635-1708)與李蔚(1625-1684)續聯<sup>142</sup>。這首〈昇平嘉讌詩〉，堪稱是在帝王率領下，衆臣濟濟一堂，同聲共氣，用詩歌渲染、歌頌太平盛世的典

<sup>136</sup> 朱彝尊：〈徐電發南州集序〉，同前註，頁315。

<sup>137</sup> 朱彝尊：〈徵士李君行狀〉，同前註，頁590。

<sup>138</sup>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4冊，卷116，頁3192。

<sup>139</sup> 宋犖：〈三家文鈔序〉，《西陂類稿》，第3冊，卷24，頁11。

<sup>140</sup> 馬齊等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00，收入《清實錄》，第5冊，頁2。

<sup>141</sup> 同前註，頁3。

<sup>142</sup> 同前註，頁4。朱彝尊：〈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曝書亭集》，頁572-573）亦有類似記述。

範之作<sup>143</sup>。

康熙十四年(1675)，時任吏部尚書的黃機(1612-1686)爲洪昇(1645-1704)《嘯月樓集》作序稱：

詩之爲道，有關於世者也，豈僅寫風雲月露之文，爲燕游酬唱之具哉！士君子讀書稽古，有志斯世，無不宜致力於詩。窮而在下，則眺覽山川，歌謠風俗，以備輶軒之采；達而在上，則入朝奏雅，入廟奏頌，以黼黻太平之治；甚巨事也。<sup>144</sup>

窮者「眺覽山川，歌謠風俗」，悠然一派牧歌風采；達者「入朝奏雅，入廟奏頌」，儼然以歌頌黼黻太平爲己任了。朱彝尊更倡言：「仕乎朝者，賡颺盛際；歸乎田者，歌咏太平。」<sup>145</sup>主張無論在朝在野，均應以歌頌太平盛世爲要。

時人爲王士禛(1634-1711)詩集作序有曰：「一代之興，天將聚才俊以鳴其盛，則必篤生一二人焉，以爲之領袖。而此一二人者，苟非有瑰瑋絕特之姿，淵綜奧博之學，固不足以勝其任。」<sup>146</sup>康熙十八年前後正是文壇風氣順應「一代之興」而轉變的關鍵時期，其時所聚「以鳴其盛」的「才俊」，正是四方匯集京師「入朝奏雅，入廟奏頌」的博學鴻儒；而堪稱領袖的「一二人者」，正是康熙朝文壇並稱「南朱北王」<sup>147</sup>的朱彝尊與王士禛。

## 五、「南朱北王」的典範意義

經歷了甲申(1644)鼎革易代變遷的錢謙益(1582-1664)與吳偉業(1609-1672)先後倡議：「詩人之志在救世，歸本于溫柔敦厚。」<sup>148</sup>「嘗語同志，欲取惠泉百

<sup>143</sup> 參拙著：《清代文學跨域研究》，頁51。

<sup>144</sup> [清]黃機：〈嘯月樓詩集序〉，收入[清]洪昇撰，劉輝校箋：《洪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70-171。

<sup>145</sup> 朱彝尊：〈沈明府不羈集序〉，《曝書亭集》，頁323。

<sup>146</sup> [清]鄭梁：〈新城王公詩集序〉，《寒村安庸集》卷2，《寒村詩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6冊），頁372。

<sup>147</sup> 參[清]孫星衍〈刑部尚書王公傳〉載稱：「（王士禛）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錢儀吉纂錄：《碑傳集》，第2冊，卷18，頁586）[清]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載稱：「順治中，海內詩家稱『南施北宋』；康熙中，稱『南朱北王』。謂南人則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則新城王阮亭、萊陽宋荔裳也。」（〔《續修四庫全書》第1708冊〕，頁24）。

<sup>148</sup>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施愚山詩集序〉，《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



斛，洗天下儉楚心腸，歸諸大雅。」<sup>149</sup>旨在以「溫柔敦厚」、「歸諸大雅」的創作風格，既救文壇之流弊，亦撫慰士人備受創傷的心靈<sup>150</sup>。到了康熙十八年前後，這樣一種傾向更蔚為潮流，以致形成以朱彝尊為首的浙西詞派及以王士禛為首的神韻詩派的文學發展大勢。

朱彝尊的文學創作風格表現，有一個與時俱進的演化過程。早在康熙十年(1671)，曹爾堪(1617-6791)為朱彝尊《江湖載酒集》作序，對朱氏前後詞風的變化進行評價：

錫鬯〔朱氏字〕時理游履，歷窮邊，汾陰之橫吹已遠，青冢之琵琶欲咽，據鞍弔古，音調彌高……頃與錫鬯同客邗溝，出示近詞一帙，芊溫麗，為周、柳擅場……盛年綺筆，造而益深。<sup>151</sup>

從早年的「琵琶欲咽」到其時的「芊溫麗」，所謂「盛年綺筆，造而益深」的變化，當與康熙朝由武功主導逐漸轉向文治主導（三藩尚未作亂）有關。

在創作主張上，康熙十年朱彝尊尚有「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sup>152</sup>的認知，到作於康熙二十五年左右的〈紫雲詞序〉，便已強調「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sup>153</sup>。

從創作實踐看，《樂府補題》的擬作唱和，更是一個令人矚目亦耐人尋味的現象。《樂府補題》是康熙十七年朱彝尊赴京應博學鴻儒科試時隨身攜帶的一本詞集，由蔣景祁出資刊刻。《樂府補題》收錄了十四位南宋遺民詞人充滿故國哀思的詠物詞作，由此引發一場擬補題唱和熱潮，先後參與擬作唱和者有朱彝尊、陳維崧、尤侗、毛奇齡、蔣景祁、徐鉉、陸棻(1630-1699)、徐嘉炎(1631-1703)、毛際可(1633-1708)、李良年(1635-1694)、陸次雲等大家名流，產生作品達一三七首，以致「輦下諸公之詞體一變」<sup>154</sup>，直接促成了詞壇風氣的轉變<sup>155</sup>。

---

籍出版社，1996年），中冊，頁760-761。

149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扶輪集序〉，《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下冊，頁1205。

150 張麗麗：〈清代漢族士人認同的發展與清詩轉變的關鍵——從王士禛「神韻」詩到袁枚「性靈」詩〉，《貴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頁169-173。

151 [清]曹爾堪：〈江湖載酒集序〉，收入朱彝尊：《曝書亭集》，頁4。

152 朱彝尊：〈陳緯雲紅鹽詞序〉，同前註，頁332。

153 朱彝尊：〈紫雲詞序〉，同前註。

154 蔣景祁：〈刻瑤華集述〉，《瑤華集》，卷首，頁8。

155 張宏生對《樂府補題》及擬補題唱和的各方面，進行了頗為全面深入的探討。參張宏生：

整個事件具有多重耐人尋味之處：朱彝尊等人在京待考博學鴻儒科之際，卻掀起這場針對南宋遺民故國之思作品的擬補題唱和熱潮，此其一；擬補題唱和的作品，幾無原作的「身世之感別有淒然言外」<sup>156</sup>，而趨向擬作「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sup>157</sup>的表現，此其二；在這場唱和過程中所體現的創作精神，也由原作的窮而後工「空中傳恨」<sup>158</sup>，轉向擬作的達而後工「歌咏太平」<sup>159</sup>，此其三。然而，聯繫前面對相關背景的分析當不難理解，《樂府補題》擬作唱和的「反常」現象，應是康熙朝文治深入，治統趨歸道統進程，與詩詞發展演變互為呼應的表徵之一。

康熙十七年，汪森(1653-1726)將朱彝尊主編的《詞綜》付梓。康熙十八年，錢塘龔翔麟(1658-1733)將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1637-1703)、李符(1639-1689)、沈岸登(1639-1702)及他自己的詞集合刻於金陵，名「浙西六家詞」，陳維崧為之作序。《詞綜》與《浙西六家詞》的先後刊刻，正式樹立了以浙西地域為標識的詞派旗幟，標舉「句琢字煉歸於醇雅」<sup>160</sup>詞學觀的「浙西詞派」由此而得名。

浙西詞派在日後的發展演變中雖然呈現不同的風貌<sup>161</sup>，但在康熙十八年前後的崛起，卻正是順應了清帝國走向盛世的發展趨勢：「浙西六家生當順康年間，正是清廷逐漸取得合法的統治地位，走向『康乾盛世』之時。浙西詞人之詠物詞情調平和，意韻淺淡，而文詞雅潔，用『盛世之音』來形容確亦不為過。」<sup>162</sup>

---

〈朱彝尊的詠物詞及其對清詞中興的開創作用〉，《文學遺產》1994年第6期，頁96-108。

<sup>156</sup> 朱彝尊：〈樂府補題序〉，《曝書亭集》，頁304。

<sup>157</sup> [清]譚獻：《復堂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冊，頁4008。

<sup>158</sup> 朱彝尊：〈解佩令·自題詞集〉，《曝書亭集》，頁224。

<sup>159</sup> 朱彝尊：〈紫雲詞序〉，頁332。

<sup>160</sup> [清]汪森：〈詞綜序〉，收入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411。

<sup>161</sup> 參劉桂華：〈論浙西詞派詞學思想的發展演變〉，《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52-56；陸有富：〈郭詞論與浙西詞派風會之轉移〉，《文藝評論》2015年第8期，頁54-57；朱惠國：〈論晚清詞壇「常」、「浙」兩派的共存與交融〉，《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5期（2007年9月），頁32-38。

<sup>162</sup> 魯竹：〈《樂府補題》與浙西六家的詠物詞——兼論浙西詞派的形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頁64-65。

清聖祖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御選歷代詩餘序〉論詞所稱「風華典麗悉歸於正」<sup>163</sup>，當是對浙西詞派「句琢字煉歸於醇雅」的遙相呼應<sup>164</sup>，只不過聖祖所標榜的「風華典麗」，更顯見盛世風姿。

所謂清詞中興，亦至此時呈現盛景。康熙十七年，佟世南刊刻《東白堂詞選初集》便是為了展現「一代詞風之盛」<sup>165</sup>，陸進亦從該集的編纂窺見「詞學之盛」<sup>166</sup>；徐士俊為結集於康熙十八年的《浮玉詞初集》作序亦稱：「詞家風氣……今則爛漫極矣。」<sup>167</sup>唯美的追求，已然成為清初詞學中興的普遍表現：「片玉珠璣，體崇妍麗；金荃蘭畹，格尙香纖；以是求詞，大致具矣。」<sup>168</sup>

文治興盛顯然是促進詞學中興的根本原因：「國家文教蔚興，詞為特盛。」<sup>169</sup>詩學的表現亦然，如朱彝尊以浙西詞派的「醇雅」標準品評同舉博學鴻儒的龐塏(1657-1725)詩風<sup>170</sup>：「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sup>171</sup>即強調「雅醇」風格，是應和盛世（一如唐開元、天寶[713-756]）而興。有論者指出，朱彝尊的浙西詞派與清聖祖所提倡的「清雅醇厚」的美學原則桴鼓相應，並與王士禛的神韻詩派共同承載了演繹康熙王朝盛世元音的政治使

<sup>163</sup> [清]沈辰垣等：《御選歷代詩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

<sup>164</sup> 有學者認為朱彝尊所編纂的《詞綜》在康乾詞壇影響深遠，官方組織編纂的《歷代詩餘》和《四庫全書總目》詞籍部分，也對《詞綜》有所參考和評價。參于翠玲：〈朱彝尊《詞綜》與康乾時期官方詞籍整理〉，《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1期（2005年3月），頁83-89。

<sup>165</sup> [清]佟世南：〈東白堂詞選初集凡例〉，《東白堂詞選初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4冊），卷首，頁521。

<sup>166</sup> [清]陸進：〈東白堂詞選初集序〉，收入同前註，頁518。

<sup>167</sup> [清]葉光耀：《浮玉詞初集》（清康熙間刻本，浙江圖書館藏），卷首，頁2。有關清詞中興的表現，參沈松勤：〈明清之際詞的中興及其詞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頁156-157。

<sup>168</sup> 蔣景祁：〈刻瑤華集述〉，《瑤華集》，頁10。

<sup>169</sup> 同前註，頁6。

<sup>170</sup> 時人所推崇的文風則有別開生面的表現，如潘耒評朱彝尊文有曰：「文至雅潔，品莫貴焉。」朱文的「雅潔」與其詩詞的「醇雅」相通，有一脈相承的美學追求，均呈現以「工」。即所謂「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竹垞之詩若詞，傳播人口，皆知其工」。不過，與朱之詩詞本於性情，多以雅美文辭寄情頌世不同，朱之文「悉本之于學」，「才雄而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為學，綜古今以鑄辭」，故能「辭約而義豐，外淡而中腴」，「是謂真雅真潔」。此現象或當另擬專文討論，在此不贅述。有關引文均見潘耒：〈曝書亭集序〉，收入朱彝尊：《曝書亭集》，頁1。

<sup>171</sup> 朱彝尊：〈叢碧山房詩序〉，同前註，頁315。

命<sup>172</sup>。

雖然王士禛不屬於博學鴻儒，但與朱彝尊相比，王士禛在政治上更早表現出對滿清政權的認同<sup>173</sup>，因此在詩歌創作上也較早呈現出治世之風。陳維崧對康熙初期的王士禛詩風即評價道：

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為詩歌也，溫而能麗，嫻雅而多則，覽其義者，沖融懿美，如在成周極盛之時焉。……阮亭先生既振興詩教於上，而變〈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讀是集也，為我告採風者曰：「勞苦諸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sup>174</sup>

在陳維崧看來，王士禛詩風的演變，即體現為變〈風〉變〈雅〉之音被溫麗嫻雅、沖融懿美之作所取代，後者便是極盛之時、天下太平的反映。

王士禛對詩壇的影響力，更值得我們注意。自年輕時代起，王士禛就顯示出頗強的文學交遊及活動能力，順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年方二十四歲，即集諸名士於濟南明湖，舉秋柳社，所賦〈秋柳詩〉四章，傳播四方，和者數百<sup>175</sup>；順治十五年(1658)舉進士，便有「山左擅詩名」<sup>176</sup>之譽。順治十六年(1659)，王士禛出任揚州推官，一方面「文章結納遍天下」<sup>177</sup>，一方面「與諸士遊讌無虛日」<sup>178</sup>，可謂「晝了公事，夜接詞人」<sup>179</sup>；在與包括日後舉博學鴻儒的汪琬、陳維崧、尤侗等文人墨客交遊唱和中，創作了大量風雅之作。如康熙三年春，王士禛與諸名士修楔於揚州紅橋，作〈冶春絕句〉二十首，獲譽「〈冶春詩〉獨步一

<sup>172</sup> 參黃建軍、邱敏：〈朱彝尊與康熙詩文交往考論〉，《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2期（2010年4月），頁78-82。「清雅醇厚」語出清聖祖對陳廷敬詩集的評價：「（陳）進所著詩集，上稱其『清雅醇厚』，賜詩題卷端。」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11冊，卷274，頁8592。

<sup>173</sup> 王士禛早在順治七年十七歲時便應童子試，爾後更連得縣、府、道第一，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

<sup>174</sup> 陳維崧：〈王阮亭詩集序〉，《陳迦陵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卷1，頁6。

<sup>175</sup> 參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王士禛撰，李毓芙等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下冊，頁2013。

<sup>176</sup> [清]方文：〈王貽上進士攜其全集見示答此〉，《龔山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587。

<sup>177</sup> 冒襄語，引自[清]李斗撰，周春東注：《揚州畫舫錄》（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卷10，頁260。

<sup>178</sup> 宋商邱語，引自同前註。

<sup>179</sup> 吳偉業語，引自同前註。

代」，唱和者衆，以致形成「江樓齊唱〈冶春〉詞」<sup>180</sup>的空前盛況。其中「紅橋飛跨水當中，一字闌干九曲紅；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sup>181</sup>最為膾炙人口，充分表現太平歲月中的江南旖旎景致。但「當年鐵礮壓城開，折戟沉沙長野苔；梅花嶺畔青青草，閑送遊人騎馬回」<sup>182</sup>，卻在旖旎景致中展現幾分悵惘情懷，頗能呼應王士禛於順治十四年「悵然有感」<sup>183</sup>而作的成名作〈秋柳四首〉。且看〈秋柳四首〉其四：

桃根桃葉鎖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

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sup>184</sup>閨情纏綿，帝子新愁，公孫舊事，交織掩映著旖旎秋色，平蕪煙柳，夕照松柏；情之令人黯然，景之令人怡逸。如此這般表現，頗能呼應前引吳偉業「洗天下儉楚心腸，歸諸大雅」的倡議。

康熙十五年(1676)及十六年，王士禛因詩文兼優蜚聲文壇，得李燾、張英(1637-1708)、馮溥(1609-1692)等名臣一再稱頌而受到清聖祖關注；其中張英所謂「郎中王某詩，為一時共推」，「一時之論，以為可傳」，極盡推崇了王士禛的詩名。於是，王士禛的文學創作與政治仕途，在康熙十七年出現關鍵性的變化：該年正月二十二日，獲召對懋勤殿，翌日，即聖祖諭詔博學鴻儒當日，獲特旨授翰林院侍讀，當年夏，入值南書房，由此開始了作為御用文臣與清聖祖長達二十六年的文學交遊（至康熙四十三年因事落職回里）<sup>185</sup>。

於是，歌功頌德更成為王士禛的創作常態，諸如：〈蒙恩頒賜五臺山新貢天花恭紀〉、〈蒙恩頒賜御書恭紀四首〉、〈孝昭皇后挽詞六首應制〉、〈御苑人參應制〉、〈大西洋貢師子歌應制〉、〈七月二十一日瀛臺賜宴恭紀六首〉、

<sup>180</sup> 參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頁2021。

<sup>181</sup> 王士禛：〈冶春絕句〉其三，《漁洋山人精華錄》（《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3冊），卷5，頁76。

<sup>182</sup> 王士禛：〈冶春絕句〉其十，同前註。

<sup>183</sup> 王士禛〈菜根堂詩集序〉有云：「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見王士禛：《帶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頁22。

<sup>184</sup> 王士禛：〈秋柳四首〉其四，《漁洋山人精華錄》（《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卷5，頁63。

<sup>185</sup> 參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頁2031-2032；潘務正：〈王士禛進入翰林院的詩史意義〉，《文學遺產》2008年第2期，頁105-114；黃建軍：〈王士禛與康熙的詩文交往考論〉，《文藝評論》2011年第6期，頁136-140。

〈滇南凱旋歌六首〉、〈三月二十二日拜御史中丞赴暢春園謝恩作〉、〈南巡頌〉、〈恭跋欽賜御書後〉、〈萬壽頌〉等等，委實可謂「應制諸作，出雅入頌」<sup>186</sup>。此類詩作，政治價值顯然遠勝藝術價值，如在前引君臣共製的〈昇平嘉讌詩〉中，時為國子監祭酒的王士禛得句為「三德六行為士坊」<sup>187</sup>，直接以君臣德行規範入詩，遠不如聖祖等人的詩句有韻味。

王士禛追求形式而忽視內涵的表現，或為時人所詬病，沈德潛(1673-1769)曾為之辯解：

或謂漁洋獮祭之工太多，性靈反為書卷所掩，故 雅有餘，而莽蒼之氣、道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然獨不曰，懽娛難工，愁苦易好，安能使處太平之盛者，強作無病呻吟乎？<sup>188</sup>

沈氏的辯解不無道理，王士禛確實有不少汲汲於堆砌典故而體現「獮祭之工」的應制之作，「尔雅有餘」，卻難有「性靈」，更少見「莽蒼之氣、道折之力」。但王士禛的詩風恰恰就在一反「懽娛難工，愁苦易好」傳統，不願「處太平之盛者，強作無病呻吟」，而是著意淡化亂世之苦，高調倡揚治世之音，正如友人徐乾學所評價：「讀先生之詩，有溫厚平易之樂，而無崎嶇艱難之苦，非治世之音能爾乎？」<sup>189</sup>如此風貌，亦正落實了時任刑部尚書李敬為康熙十年編成的《漁洋詩集》作序所預言：「他日廟堂之上，以文章揚一代之盛者，必先生也。」<sup>190</sup>

如果說，王士禛的應制詩刻意歌功頌德，高倡盛世元音；那麼，其神韻詩則更多是借助山水景色的描繪，展現清麗空疏的風格。這樣一種風格的追求，頗有吳偉業所謂「洗天下儉楚心腸，歸諸大雅」的用意。從朝廷的立場看，固然希望以眼前山光水色洗滌士人內心的故國幽思，新朝詩壇也由此得以發揚新詩風。清聖祖以韋莊(836?-910?)〈袁州作〉詩句「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閑開古畫圖」御賜王士禛<sup>191</sup>的用意，或許可作如是觀。無獨有偶，曾倡言「庶幾同學之

<sup>186</sup> [清]張希良：〈柳村詩集序〉，[清]董訥：《柳村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2冊），卷首，頁149。

<sup>187</sup> 馬齊等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00，收入《清實錄》，第5冊，頁5。

<sup>188</sup> [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1。

<sup>189</sup> [清]徐乾學：〈漁洋山人續集序〉，《憺園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3冊），卷21，頁129。

<sup>190</sup> [清]李敬：〈漁洋詩集序〉，王士禛：《帶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14冊），頁6-7。

<sup>191</sup> 王士禛《居易錄》卷三十一載稱：「[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內值，蒙恩再賜御書大字一聯云：『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閑開古畫圖。』御璽三：曰佩文齋，曰康熙御筆，曰

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sup>192</sup>的黃宗羲，亦寄望「遊山題畫，種花載書，雅集懷人，一切囂塵烟火不入筆端，恍然身在隆平之日」的新時代詩風，得以「潤色枯槁」、「翱翔王路」<sup>193</sup>。由此可說，王士禛的神韻詩更著重於以清麗空疏的藝術風貌，渲染清明隆平的盛世風情<sup>194</sup>。

到了康熙朝後期，王士禛以位尊望隆執詩壇牛耳，「公之及門半天下，凡在朝以詩名者，莫非門下士」<sup>195</sup>。王士禛引領的神韻詩風渲染了康熙朝的文治盛世；而文治盛世更成就了王士禛的詩壇領袖地位，雍正朝(1722-1735)的鄭方坤即評曰：「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為一代之宗。」<sup>196</sup>至同治朝(1861-1875)的李元度(1821-1887)亦作此評價：「國家文治軼前古，挖雅揚風，鉅公接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公以詩鳴海內五十餘年，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之為泰山北斗。……公以大雅之材起而振之，獨標神韻，籠蓋百家，其聲望足以奔走天下。」<sup>197</sup>推崇備至若此，可謂無以復加。文治、盛世、王士禛、神韻詩風之間相互密切的關係，亦得以充分闡述。

除朱彝尊與王士禛外，其他活躍於康熙朝文壇的領軍人物如馮溥、宋犖、湯斌(1627-1687)、田雯(1635-1704)、宋琬等，均有多元各異的文學主張，卻也不同程度的呈現歌頌休明與唯美風氣相結合的創作傾向。如曾同獲薦舉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試的倪燦與王嗣槐<sup>198</sup>，便評譽博學鴻儒科試閱卷官之一，亦是向清聖祖推舉王士禛的馮溥的詩為「春容而弘麗，鏗鏘而鞞鞞，灑灑乎如四時之有春，而五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於是」<sup>199</sup>；「舖張揚厲，優游彬蔚，美盛德之形

---

保合太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9冊〕，頁698。）

<sup>192</sup> 黃宗羲：〈董在中墓誌銘〉，《南雷文定·三集》，卷2，頁21。

<sup>193</sup> 俱見黃宗羲：〈汪氏三子詩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8-39。

<sup>194</sup> 乾隆年間，沈德潛與清高宗對談中，便將王士禛詩推舉為康熙朝盛世之音（「曩日之盛之語」）的典範。參〔清〕昭槤：《嘯亭雜錄》（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卷9，頁273，「王文簡公補謚」條。

<sup>195</sup> 宋犖：〈王公墓誌銘〉，收入王士禛撰，孫言誠點校：《王士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附錄，頁110。

<sup>196</sup> 〔清〕鄭方坤撰，馬俊良刪訂：〈帶經堂詩鈔小傳〉，《本朝名家詩鈔小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第2冊，頁7。

<sup>197</sup>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第1冊，卷6，頁1。

<sup>198</sup> 倪燦以一等二名入榜，官授翰林院檢討；王嗣槐則因年老不與試，仍獲授內閣中書。

<sup>199</sup> 〔清〕倪燦：〈佳山堂詩集跋〉，收入〔清〕馮溥：《佳山堂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5冊），卷末，頁243。

容，以昭成功也」<sup>200</sup>。就連堅不仕清的黃宗羲所擬〈斬熊封詩序〉，亦在讚譽王士禛門人隸漢軍鑲黃旗的靳治荊（字熊封）「爲詩富豔精工」後，聲稱：「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sup>201</sup>由此可見，以唯美創作渲染太平盛世已然蔚爲時代風尚。

## 六、結語

綜上所述，清初統治者爲順應武功定天下，文治開太平的戰略轉型，通過治統與道統合一的論述與運作，頗爲成功地將華夏文化的道統與滿清新朝的治統銜接起來。於是，一方面爲漢文人心態的轉變打開了可行的通途，一方面也爲新朝政權的正統性、合法性與正當性奠定了堅牢的根基；二者互爲作用，相得益彰，文治的理想得以順利實踐乃至實現，並且頗爲成功地由文治走向盛世；走向盛世的現實，又反過來持續促使並堅定了漢文人心態的轉變，更進一步保證並鞏固了滿清王朝的長治久安。正是在這麼一個時代大轉變的背景下，清初詩詞產生了頗具時代意義的發展變化。

由文治而達盛世，固然合乎一般性的邏輯推斷，亦是合乎一般性的歷史現實；然而，從滿清統治者的角度考察，最終目的乃是確立其政權的正統性、合法性與正當性。這樣一個目的，在康熙朝後期，已在相當程度得以實現。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聖祖諭曰：「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sup>202</sup>康熙六十一年，則宣稱：「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sup>203</sup>不僅宣示爲休明盛世，更自詡爲中國歷代王朝正統之最，其自得與自信之意，溢於言表。

因此，清初詩詞「達而後工」說之「達」，並非僅指作者個人境遇之「達」，更多跟時代（尤其是康熙十八年後）的太平昌盛密切相關。強調對時代、社會太平昌盛的歌頌，便成爲「達而後工」說的關鍵所在<sup>204</sup>。對由亂世走向

<sup>200</sup> [清]王嗣槐：〈佳山堂詩集序〉，同前註，頁17。

<sup>201</sup> 黃宗羲：《南雷文定·後集》，卷1，頁8-9。

<sup>202</sup>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5冊，卷128，頁3490。

<sup>203</sup> 馬齊等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75，收入《清實錄》，第6冊，頁695。

<sup>204</sup> 這是就社會主流及創作主流而言，不排除有與此相異甚或相悖的社會現象及其相應的詩詞觀念與創作。參 Mark Elvin, "Unseen Lives: The Emotions of Everyday Existence Mirrored in Chinese Popular Poetry of the Mid-Seven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n *Self as Image in Asian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Roger T. Ames, Thomas P. Kasulis, and W. Dissanayake (New



盛世的順、康二朝（尤其是後者）的歌頌，無疑就是滿清王朝政權治統道統合一的正統性、合法性與正當性，在漢人社會精英階層得到較為徹底的認可與肯定。惟其如是，方能實現文治，走向盛世，確保滿清王朝長久而穩定的統治。清初詩詞風氣的轉變，便是順應並反映了這麼一個時代的要求，清聖祖所稱「用昭昇平盛事，冀垂不朽」，實可謂一語中的。

---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pp. 113-199 ; Lijian Wang, “*Da Er Hou Gong* 達而後工: A Literary Concept as a Result of the Flourishing Time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662-1722),” pp. 133-137。

# 清初漢文人心態的轉變及其對詩詞 風氣的影響

——以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

王力堅

滿清統治者創建王朝，入主中原的過程，是一個由武功主導走向文治主導的戰略佈局。到了博學鴻儒科的詔開，這一戰略佈局得以基本完成。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儒科的舉辦，不僅是吸收人才，也不僅是爭取民心(士民之心)，更重要的是爭取滿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確切說，是滿清作為異族入主中原，秉承正統，承續法統的歷史迫切性所致；也是對已有的漢文人效忠者進行體制化、典範化，爭取漢文人對新朝法理正統的認可與遵奉；從而促使漢士人心態／立場／身分的轉型完成。對清初詩詞風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詩詞觀念上，由「窮而後工」轉向「達而後工」；創作精神上，由「諷喻美刺」轉向「歌功頌德」；風格形態上，由「幽愁慷慨」轉向「睿藻炳然」。

關鍵字：清初 漢文人心態 康熙十八年 博學鴻儒科 詩詞風氣

The Shift in the Mentality of the Han Literati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endencies of  
*Shi*- and *Ci*-Poetry: An  
Examination of Erudition and Literature in the  
Eighteenth Year of Emperor Kangxi (1679)

WANG Lijian

The strategy of Manchu rulers in their early reign was to transform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into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This strategy was proved successful when the “Examination of Erudition and Literature” was held in the eighteenth year of Emperor Kangxi (1679). The purpose of the examination was not only to attract talents and to win popular support,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legitimize the Qing dynasty. As foreign rulers of Central China,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an obligation to seek legitimacy to keep stable control. Meanwhile, ethnic Han literati were institutionalized as loyalists to recognize the new legal orthodoxy, and they were consequently prompted to shift their mentality and identity. The situation influenced tendencies of *shi*- and *ci*-poetry in three main aspects: First, the idea that literature would excel in adversity was refashioned into the idea that it would excel in prosperity. Secondly, glorification and praise were to replace critiques of reality. Thirdly, sparkling imperial diction took the place of the style of brooding melancholy.

**Key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mentality of ethnic Han literati  
the 18<sup>th</sup> year of Emperor Kangxi (1679)  
Examination of Erudition and Literature  
the tendencies of *shi*- and *ci*-poetry

## 徵引書目

- 于翠玲：〈朱彝尊《詞綜》與康乾時期官方詞籍整理〉，《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1期，2005年3月，頁83-89。
- 王力堅：《清代文學跨域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
- \_\_\_\_\_：〈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科的現實目的及歷史意義〉，《長江學術》2015年第2期，頁32-38。
-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_\_\_\_\_：《王士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_\_\_\_\_：《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_\_\_\_\_著，李毓芙等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_\_\_\_\_：《居易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_\_\_\_\_：《帶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14-14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_\_\_\_\_：《漁洋山人精華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
- \_\_\_\_\_：《讀通鑒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12年。
- 王先謙：《東華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王富鵬：〈論明遺民對清政權的接受和認可——以陳恭尹交遊的轉變過程為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4期，2009年7月，頁47-51。
- 王學泰：〈「康雍乾」三朝對於士人的馴化——再說清代有經學無儒學〉，《雨花》2012年第6期，頁33-39。
- 文慶等：《國子監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方文：《禽山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尤侗：《尤西堂雜俎》，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孔定芳：〈清初朝廷與明遺民關於「治統」與「道統」合法性的較量〉，《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頁189-197。
- \_\_\_\_\_：《清初遺民社會》，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 毛文芳：〈一則文化扮裝之謎：清初〈楓江漁父圖〉題詠研究〉，《清華學報》第36卷第2

期，2016年12月，頁465-521。

- 巴泰等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1987年。
- 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朱庭珍：《筱園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0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朱惠國：〈論晚清詞壇「常」、「浙」兩派的共存與交融〉，《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頁32-38。
- 朱彝尊：《曝亭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宋琬：《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
- 沈辰垣等：《御選歷代詩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沈松勤：〈明清之際詞的中興及其詞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頁156-157。
- 沈雄編纂，江尚質增輯：《古今詞話》，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杜登春：《社事始末》，收入《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李斗撰，周春東注：《揚州畫舫錄》，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
-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
- 李天根撰，倉修良、魏得良校點：《燭火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李因篤：《受祺堂詩》，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李光地撰，陳祖武點校：《榕村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 李集輯，李富孫、李遇孫續輯：《鶴徵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2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289-344。
- 李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6月，頁131-162。
- ：〈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頁291-324。
- 李嬋娟：〈從《國朝三家文鈔》之編選看清初文風之轉變〉，《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3期，2006年5月，頁95-101。
- 佟世南：《東白堂詞選初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4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宋榮：《西陂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 ：《綿津山人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

- 汪琬：《堯峰文鈔》，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_\_\_\_：《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昭璉：《嘯亭雜錄》，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
- 姜勝利：《清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洪昇撰，劉輝校箋：《洪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高強：〈試論清廷封禁東北之根源〉，《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2期，2008年4月，頁44-46轉55。
- 高蓮蓮：〈遊幕與清初士人心態及詩風演變——以康熙己未博學鴻儒科布衣處士士人群為考察對象〉，《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2012年9月，頁55-59。
-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徐乾學：《憚園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秦瀛：《己未詞科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納蘭性德：《飲水詩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夏琳：《閩海紀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馬齊等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1987年。
- 啓功：《啓功叢稿·題跋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張宏生：〈朱彝尊的詠物詞及其對清詞中興的開創作用〉，《文學遺產》1994年第6期，頁96-108。
- 張政偉：〈以經為法：廖燕文學觀的另一個面向〉，《靜宜中文學報》第1期，2012年6月，頁121-144。
- 張惠民編：《宋代詞學資料匯編》，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張煌言：《張蒼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張麗珠：〈「一代賢奸托布衣」——萬斯同之明史修撰與浙東史學的聯繫〉，《成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9年7月，頁45-47轉49-84。
- 張麗麗：〈清代漢族士人認同的發展與清詩轉變的關鍵——從王士禛「神韻」詩到袁枚「性靈」詩〉，《貴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頁169-173。
- 曹亮武、蔣景祁、潘眉合輯：《荊溪詞初集》，清康熙十七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陳平原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陳恭尹：《獨漉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1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陳維崧：《陳迦陵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陸有富：〈郭馨詞論與浙西詞派風會之轉移〉，《文藝評論》2015年第8期，頁54-57。
-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1991年。
-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年。
- 黃人：《大獄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
-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 \_\_\_\_\_：《南雷文定》，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
- 黃建軍：〈王士禛與康熙的詩文交往考論〉，《文藝評論》2011年第6期，頁136-140。
- \_\_\_\_\_、邱敏：〈朱彝尊與康熙詩文交往考論〉，《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2期，2010年4月，頁78-82。
- 黃嗣艾：《南雷學案》，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59年。
- 彭傳華：〈正統、道統、治統——王船山對於政權合法性來源的思考〉，《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13年3月，頁16-21轉34。
- 馮溥：《佳山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萬斯同：《石園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葉光耀：《浮玉堂初集》，清康熙間刻本，浙江圖書館藏。
- 董訥：《柳村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楊念群：〈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論」：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頁116-124。
- 楊鳳城等：《千古文字獄·清代紀實》，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
- 趙剛：〈康熙博學鴻詞科與清初政治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1期，頁90-96轉43。
- 熊賜履：《經義齋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0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劉文鵬：〈在政治與學術之間——20世紀以來的「康乾盛世」研究〉，《學術界》總第146期，2010年7月，頁174-191。
- 劉方玲：〈得國之正到承統之正：清史中的正統論〉，《求索》2008年第9期，頁221-223。
- 劉廷璣：《在園雜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劉桂華：〈論浙西詞派詞學思想的發展演變〉，《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52-56。
- 劉敬：〈清初的逃禪風潮與文學通變——由逃禪復社士人的文學活動看復古文學思想的清初走向〉，《文學與文化》2014年第1期，頁128-133。
- 劉煥性：〈「康乾盛世」之說的由來〉，《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108-109。
- 魯竹：〈《樂府補題》與浙西六家的詠物詞——兼論浙西詞派的形成〉，《南陽師範學院學

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頁64-65。

鄭方坤:《本朝名家詩鈔小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

潘耒:《遂初堂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潘務正:〈王士禎進入翰林院的詩史意義〉,《文學遺產》2008年第2期,頁105-114。

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_\_\_\_\_ :《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蔣秋華:〈陳廷敬與汪琬的交誼〉,《經學研究集刊》第4期,2008年5月,頁1-14。

蔣寅:〈由古典文學看歷史上的夷夏之辨與文化認同〉,《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頁19-31。

\_\_\_\_\_ :〈「神韻」與「性靈」的消長——康乾之際詩學觀念嬗變之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2年5月,頁10-26。

\_\_\_\_\_ :〈遺民與貳臣:易代之際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擇——以明清之際為中心〉,《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9期,頁26-37。

蔣景祁:《瑤華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鄭梁:《寒村詩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儲人獲:《堅瓠五集》,收入劉獻廷等著:《清代筆記叢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謝正光:〈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漢學研究》第17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31-60。

魏禧:《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_\_\_\_\_ :《魏叔子文集外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0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譚獻:《復堂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嚴繩孫:《秋水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蘇循波:〈清修《明史》與政治合法性的建構〉,《求索》2013年第3期,頁67-70。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

Elvin, Mark. "Unseen Lives: The Emotions of Everyday Existence Mirrored in Chinese Popular Poetry of the Mid-Seven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n *Self as Image in Asian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Roger T. Ames, Thomas P. Kasulis, and W. Dissanayak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Kessler, Lawrence D.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 (1971): 179-200.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McCraw, David R. *Chinese Lyricis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eterson, Willard J. "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682)." Part 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 (1968): 114-156.

\_\_\_\_\_. "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682)." Part I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9 (1969): 201-247.

Struve, Lynn A. "Ambivalence and Action: 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 In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Eds.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Vol.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Wang, Lijian (王力堅). "Da Er Hou Gong 達而後工: A Literary Concept as a Result of the Flourishing Time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662-1722)." *Ming Qing Yanjiu* 《明清研究》 (2001): 115-142.

Wu, Silas H. L.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